

做好“山”文章 绘好“水”景图 布好“名城”局

记忆中的西北陈(一)

□ 张庭祥

长子县抗日游击战的第一枪

1937年8月,高扬文到长子县担任组织人民武装的职务是长子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副总队长。高扬文于县时,县里已有牺盟会,特派员是河南人胡广恩,上命他兼人民武装自卫队总队长。于是,高扬文就到牺盟会驻在城隍庙里,他就在庙内一间小房“安窝”,其实那时一个兵也没有。胡广恩那时还不是共产党,每天忙于做县长、士绅们的工作,还没有考虑组织人武装问题。不过牺盟会有几个工作人员,如康福申、李武科、张显图等,都是以太原、北京、天津回来的学生,都希望和高扬文合作。有了本地干部的支持,高扬文决心在长子县干一番事业。

怎样“招兵买马”,把队伍组织起来呢?高扬文刻了一个名为人民武装自卫队总队长高扬文(此时高扬文的名高扬文)大印,盖在石印的“游击战争训练班招生布告”大街小巷和附近农村到处张贴,广为宣传。这个办法生效,几天的工夫,就有三十多人来报名,参加游击训练班的人有本县的中小毕业生,有从太原回来的工人,素来好的。通过他们串联,又来了二十来个人。有了一支队就抓派训班,早晨带领他们跑步,上午讲政治课,讲抗争的性质和形势,讲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游击战的重要性。下午进行军事训练,训练不到两天大家抗日情绪高涨,政治、军事理论知识也掌握很快,文就以这些队员中觉悟比较高的为骨干,委任他们为班长、政治工作人员,放他们回家招收队员,很快就招来工人,组成两个中队,分别由康福申、李定坤担任中队。很短时间内组成了—支队伍,总队部也从牺盟会迁到离小,队伍驻在文庙内。

牺盟总会发来十几支枪,但枪少人多,怎么办?自卫队领导办法搞枪来武装队伍。胡广恩被派来当县特派员时,牺盟总会发来四支三八式步枪。高扬文来长子时,一支冲锋枪,李定坤家里存有一支三八式步枪也交了后来牺盟会又发来几支步枪。其它二十余支枪都是国民党逃兵的枪补充起来的。1937年11月,川军有几支游勇,在忻州一带带了仗,退了下來,那时自卫队几乎都要派侦察员到城外北大高庙去缴武器。一旦发现枪的逃兵回来,几个人马上带枪出动,取下他们的枪;要誓死保卫华北,不能退到黄河以南去。你不敢抗日,就把枪留下,让我们用它打日本鬼子吧!”高扬文对这些这样说。有一天自卫队忽然得到消息,说是从北边来一个国民党军官,骑着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向城里走来,手拿着好多东西,身上还挎着枪,于是,高扬文、张显图和李定坤四个人四支枪,立刻向北门外出发,埋伏在中段的左端岸边,待他进入埋伏圈时,四人就大声喝令:“不许动,举起手来。”因为来的突然,这位军官一下子,当他稍为镇静下来的时,已经被俘虏了。这次行动非常,这位国民党军官的坐骑是火驹的大家马,一过秤,整整重。很显然,这东西来路不正。高扬文对他进行了教育,也实行优待政策,给了足够的路费,晓以抗日救国之大义,便将他释放了,这样反倒给牺盟会、自卫队解决了一些问题。牺盟会干部和自卫队干部战士,每人除发薪金有一定的生活津贴费。牺盟会干部包括每个学员,每定做了一件灰衣棉军装。

秘密加入党组织

0月20日,陈华夫找高扬文谈话,他说:“我受省委之你谈谈加入共产党的问题。”高扬文一听非常高兴,说:“入党是我盼望已久的,在决死队时已和黎晓初谈过的问题,但因为走得仓促,没有办成。”陈华夫拿出表格,说:“你的情况,我已了解,你就填表吧,介绍人找。”那时长子县没有党组织,不用履行组织批准手续,有候补期,高扬文就成了一名正式党员。接着,在李区长工作住处,高扬文与康福申、李定坤、李武科一起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11月,在太南特委书记裴

孟飞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长子县委员会。陈华夫为书记,李定坤为组织委员,康福申为宣传委员,高扬文为军事委员,陈华夫作为人民武装自卫队指导员和高扬文住在一起,总队部也就成为县委机关。不久,康福申调走,高扬文又兼任宣传委员。年前李定坤也调走了,上级派来张化波(王一新)任组织委员。县委加紧训练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派往各区,建立区委,发动群众,建立基层组织。但是由于县长白玉堂和县公道团团长都是阎锡山的嫡系,非常反动,虽然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但他们也能得到消息,指示各区区长和编村村长,严密监视,横加阻挠,还用密电向阎锡山告自卫总队的状。农村工作遇到了困难,开展不快。再加上牺盟会特派员胡广恩也和县委配合不够,迟迟没有把农、工、青、妇救国会组织起来,反而先组织一个士绅救国会。而且还遇到一件严重的事,高扬文在自卫队中发展一名党员,名叫常家驹,一天早晨,常家驹正在高扬文的宿舍填写入党志愿书,高扬文在外屋洗脸,不料特派员胡广恩进了屋,抢走了正在填写的志愿书。向他索要,他不给,还说不让在自卫队中发展共产党,此事违反规定要上报,弄得大家非常紧张。后来通过胡广恩的未婚妻刘弗菊,把志愿书要了回来。为了此事,太南特委裴孟飞书记特地来长子,把常家驹调走,给予高扬文警告处分。在复杂环境中,长子县委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初步打开了工作局面。

日军轰炸长子城

1938年2月,占领太原的日军开始向晋南进攻,平汉线上的敌人,也向晋南进攻。这时敌人的飞机不断飞到城上天空侦察。2月20日和21日,敌机两次轰炸长子城。20日战士们出城躲过了,但21日队伍正准备出城,敌机即来到头上,炸弹就下来了,结果炸死一人,炸伤三人。敌机飞去,由康福申带领队出城,高扬文处理善后,包扎好受伤者,掩埋了牺牲者。等出城后,才知道队伍一下子跑了百把人。这些战士都是附近的农民,从来没经过这种场面,害怕,逃跑是免不了。高扬文整顿好队伍,向大家讲话,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它的军队打进来了,无论跑到哪里也不安全,只有奋起战斗,打跑日本鬼子,才能保安全,才能不当亡国奴,希望大家振作起来,准备和侵略者战斗,不怕流血牺牲,救国、救家、救自己,为死难的战友、同胞报仇。他的一番话,把战士们的情绪稳定了。3月上旬,日军先后占领长治、晋城、临汾、运城等地,我八路军在河北鲁莽并段县长生口、涉县响堂铺、山西路城县神头岭伏击进犯之敌,三战三捷。日军飞机为了配合陆上进攻,出动更加频繁,每日轰炸晋南各县。长子县几经轰炸,破坏很重,群众受伤数十人。为了躲避敌机轰炸,城内老百姓大部分都跑到乡下去了。白玉堂领上部队到城西50里的山沟里的李家庄躲起来了。县委研究,再待在城里也无意义,也决定撤离到西山,县委撤到张家庄后西山地区的张家庄。

县委和自卫队到张家庄后,高扬文从100人的队伍里挑选了20个人,带上15条枪,组成一个小分队重返长子城,维持秩序,把剩下的和枪交给张化波、李锦春管理。小分队在城里各处巡视一番,只见被炸毁的当铺里许多衣物都埋在破砖碎瓦里,商店里的货物都散落在大街上。战士们从断垣残壁中,捡来绸棉袍,美滋滋地穿在身上。这是他们一辈子都穿不上的好衣服。高扬文命令大家,不准乱拿老百姓的东西,他们用了一天的功夫,把各处余火扑灭。原来居住五六千人的县城,现在只有21人,小分队先把把城都关上,防止城外的人到城里乱拿物品。接着开始清理街道,把物品送还原处。逃到城外的群众,看到小分队回来了,有的返回家里。刚稳定下来,西北军一个连也来了,连长姓高,他说是奉命守城的。高扬文和商连长商谈,敌人可能从长治来攻东门,也可能迂回攻北门或南门。经商定,西北军有机枪守东门和南门,自卫队守北门和西门。西北军的团部在晋城南门外十里外的尧庙山驻扎。3月15日,日军攻打长子城,有十几门马拉的大炮,轰击东门,后面跟着一大

群骑兵和步兵。商连长用机枪还击敌人,自卫队也用步枪射击迂回到北门的骑兵,战斗很激烈,但只有一顿饭的工夫,东门就被轰开,日军骑兵、步兵就向城里冲。城是守不住了,高扬文和小分队从西门撤出绕到北,经过草坊村,向敌后转移。商连从南门撤走,日军尾随追击,攻到他们团部驻地,战斗又激烈起来,不久枪炮声停止了,日军没有在大子城驻扎,直奔高平县而去。西北军这一团官兵,受了很大损失。高扬文率领小分队转移很快,没有被敌人发觉,一个人也没有有损失。

他打响了长子县抗日游击战第一枪

1938年4月4日,日军为解除后方威胁,发动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长子县有被占领的危险。高扬文知道小分队没有能力守城,就把小分队带到从长治到长子的东大路转移,准备和敌人打游击。为了制造声势,小分队一个晚上转移两个中队,群众不知底细,纷纷传说,晚上来了许多八路军,住了好几个村子。

战斗的机会来了。大京村一个村民来报告,有一个日本鬼子到了村公所,要肉吃,要酒喝。高扬文问是不是只有一个鬼子,村民说只有一个,他还骑着一匹高头大马。

高扬文立即召集队员,吩咐任务,高扬文带着一班长和两个队员,对付那个鬼子,两个队员去牵那匹大马,其余的人听二班长指挥,在村东埋伏,如有敌人前来,坚决打击。布置完毕,他们跑步前进。高扬文和一班长进入屋内,两个战士在外把门,防备日本鬼子逃跑。日本鬼子把一支步枪靠墙放着,正在喝酒。高扬文趁他抬起胳膊时,掏出八音手枪照他腋下打了一枪,鬼子吼叫一声倒在地上,把门的战士闻声进屋,两个人压住他,另一个战士孙富荣手拿大刀用力砍日本鬼子的脑袋,因为不要要领,砍了三十多刀才把头砍下来。战士把一颗血淋淋的头包好对他说:“队长,你快骑上大马,提着这颗脑袋,到处跑一趟,让大家看看我们杀了日本鬼子。”高扬文提上日本兵的头,骑上了日本大洋马,一路奔跑,奔向县政府所驻的李家庄。六十多里路跑了半天,到了村里,高扬文把人头挂在县政府门外的大树上,高声喊叫,请县长出来看看日本鬼子的头。他骑上马回到县委驻地,把马放下,连夜又赶回大京村,一天跑了120里路。

营救战友 勇斗顽固县长

正在小分队继续寻找战机的时,总队部派人给高扬文送信,要他迅速回队,营救张化波和李锦春,他俩已被白玉堂逮捕了。高扬文一听怒不可遏,白玉堂竟敢做这种卑鄙的事情。他带着小分队急忙赶回县政府驻地李家庄村外,作了布置,他说:“大家在村外待命,一旦听到枪声,就向县政府冲击。”高扬文怒气冲冲大步踏进白玉堂办公室,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对白玉堂说:“我们在前方打仗,你在后方捣乱,你有什么逮捕张化波、李锦春?”他说:“他们有奸奸嫌疑。”高扬文拍桌子一拍:“胡说,他们是堂堂正正的牺盟会干部,你捏造罪名,太可恶了。今天你不放人,咱们武力相见,我的部队正在村外,你要较量较量吗?”他说:“等我问问清楚再讲。”高扬文说:“不行,现在就要放人,跟我一块走,否则我就不客气了!树上的日本鬼子人头可以作证。”白玉堂说:“张化波投手榴弹打警察,不能放!”高扬文说:“警察抓他,他自然要抵抗,这是自卫,完全应该。”白玉堂自知理屈,又看高扬文怒火不消,也不知村外有多少人马,无可奈何地叫警察把人交给了高扬文。高扬文带着他们两个人,把队伍集合起来,回到张家庄。高扬文建议,迅速转移,离县政府远些,加强站岗放哨,不要让警察进村。张化波说:“还是手里有武装好,否则我俩的命就难保了。”高扬文回到县委以后,和陈华夫、张化波同志商量对策。大家一致意见,白玉堂手下还有一百多名武装警察,可能受军机挑畔。我们的游击队人不能再到前方,要留在后方,保卫县委机关的安全。而另一支由特派员带领的游击队,可以继续留在前方。事后,县委为避免与白玉堂的之间发生摩擦,迁往距李家庄村30多里的罗辛庄村办公。

闲议“面羊”

□ 秦玉贵

般都要为孩子过生日,一岁做“一个生日”,两岁时做“两生日”,三岁时做“三生日”。为孩子过生日的人很多,一般都要为孩子送一把“生日锁”,用一条红头绳和三个铜钱编成环状。受父母和外公家的生日礼物较多,多是牌状银质的,上面有龙凤等图案,并有“状元及第”“五子登科”“龙凤呈祥”“长命百岁”等字样。这些锁都戴在孩子的脖子上,长命后挂在正房门里的门上,既有安全保卫的意义,也有避邪意义,金银锁则更受喜欢。

有神论者说,过生日收到这么多的生日锁,生日锁像铜墙铁壁一样围着孩子,生日锁成为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圈圈安保系统,能驱逐邪气,不受各种疾病、灾难等的侵犯。孩子过生日用面羊做礼物,主要有答答家、外公家和自家的三份羊。每一份羊三个,其中一个羊戴着面锁。供神的面羊为什么是三份三个呢?三者,多也。三人为大家,则三羊成群,多者人心诚,心诚神威灵。

岚河边打了一场伏击战

小分队返回游击区两天后,群众又送来情报,说有个日本兵进了杨墓村,正找向导,可能要到岚河。高扬文只有十几个兵,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打过它一个伏击。过打骑兵的战术,因骑兵跑得快,要集中火力打。他把十几个队员一条线埋伏在岚河边的高地草丛里,待骑兵走到岚河桥的中间,十几支枪一齐开火,打桥上兵。让五个没有枪的战士带上鞭炮、水桶,埋伏在一个后,看到小分队撤退时,就在铁桶里燃放鞭炮。果然日兵过河了,但不是只有骑兵,后面还有步兵。高扬文一下,瞄准桥上的骑兵射击,日本兵毫无准备,纷纷跌下。战士们一连打了五、六排枪,连步兵也中了他们的子弹。日本兵遭到伏击,迅速跑到河对面的高地,用重机枪那弹筒向小分队射击。子弹纷纷打到战士们周围的一个弹片划破了高扬文的额头,他也没有觉得。“打不跑。”他下令迅速撤退,因子弹来得密,就在撤退后不他们一齐向高地旁的一条路上撤。高扬文派了几班二班长樊志坚一动不,就拉他快走,樊志坚伸出一是的手,摆一摆,叫高扬文他们快走。显然他已受了重伤也拉不动他,只好把他丢在阵地上。滚到地上比高地低,他们可以弯腰向后跑。就在高扬文撒开后面鞭炮齐鸣,掩护他们,日本兵不知虚实,冲到高地再没有前进。但可怜的老百姓遭到报复,被杀工人。日本兵退后,他们重返高地,只见二班长被刺刀战士们把牺牲的英雄掩埋了,就地开了一个追悼会。高扬文流着泪说:“这个仇一定要报,我们要多杀日本鬼子,报仇!报仇!”小分队到杨墓村,村里一片哭声。他们慰问死难家属,希望村民组织起民兵,保卫这次伏击战日本鬼子死伤十多人。

生牛奋战为人民

1938年4月29日,粉碎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根据地后,晋东南包括长子在内的8座县城得以收复。长子县委机关从罗辛庄村返回县城,驻西街当铺院办月初,中共长子县委鉴于自卫总队已有党员87人的为了便于领导,决定总队建立党总支支部,中队建立党总支支部,连队建立党总支支部,高扬文任总队党总支连志堂、裴谦分别任二、三中队党支部书记。县委积极发动群众,筹备成立工、农、青、妇组织,成立各区区委,在发动群众,口号是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在斗争中,发展分子,发展党员,改造村政权,这是开辟村庄的工人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1938年5月,高扬文正在和县委的同志们筹划到发动群众、改造旧政权、开展建党工作,突然接到特委通知,调他到晋冀豫省委党校学习的通知。

1938年12月,高扬文从长子县调出后,在省委学习半年后,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他历任中共沁县县委书记、中共大地上第一地委组织部部长兼沁县县委书记、太岳区第一地委书记兼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兼共太岳区宣传部部长。1943年8月,任延安中央警卫,1944年起任延安《解放日报》评论组组长、国内部兼新华社通讯社国内部主编。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豫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中共七大。1949年4月至9月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5月至9月任青年团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办公室主任、书记、书记。1952年后,任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局局长、冶金工业部部长助理、冶金工业部副部长,部党委副书记。1961月,兼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66年5月至1966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1978年3月至198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1979年12月,任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曾任国家能源委员会常务副组长、党组书记。第一、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八大、十二大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2011月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家乡的老人们传说,七月初五是炎帝的忌日,十五元宵节就是纪念炎帝的节日。七月十四日用两个大谷穗的面羊供献三神,在庙前挂彩财。是夜外岭顶和路旁点燃村民们提前准备在这里成堆的柴草,“熊熊大火照亮天空,怀念刀耕火种。十五早晨草叶滚滚欲滴的露水,把地头财挂在禾秆上,同时株带根的麻苗自带根的谷苗,分成两团,在五谷门上一组一列,在自家门上的一组一列,以示怀念炎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